

新编日本近代史

宋成有 著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新编日本近代史 宋成有著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博雅大学堂·历史)

陈序华 魏金枝 魏金枝 魏金枝

I 新... II 宋... III 日本近代史 IV 日本史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 第 号

书 名:新编日本近代史

著作责任者:宋成有 著

责任编辑:刘 方

标准书号:陈序华 魏金枝 魏金枝 魏金枝

出版发行:北京大学出版社

地 址:北京市海淀区成府路 号 层

网 址:陈序华 魏金枝 魏金枝 魏金枝 电子邮箱:陈序华 魏金枝 魏金枝 魏金枝

电 话:邮购部 发行部 编辑部

印刷者:北京大学印刷厂

经 销 者:新华书店

陈序华 魏金枝 魏金枝 魏金枝 开本 张 千字

年 月 第 版 年 月 第 次印刷

定 价:元

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之部分或全部内容。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举报电话:陈序华 魏金枝 魏金枝 魏金枝 电子邮箱:陈序华 魏金枝 魏金枝 魏金枝

目 录

前 言

第一章 幕府时代的历史遗产

第一节 权力更替机制的遗产 :双重二元政治结构 及其功能

- 一 幕藩体制的制度构成要素
- 二 幕府集权与诸藩分权的二元政治结构
- 三 将军至强与天皇至尊的二元政治结构

第二节 经济遗产 :国内市场机制的发展

- 一 江户时代前期的国内市场
- 二 江户时代中后期国内市场的发展
- 三 国内市场演化的多重意义

第三节 思想遗产 :学术流派的活跃

- 一 旧学说在分化
- 二 新学说层出不穷

第四节 庶民教育的遗产 :寺子屋教育的普及化

- 一 寺子屋教育的由来与发展
- 二 寺子屋教育的社会意义和影响

第五节 幕末改革 对明治维新的进程产生直接影响

- 一 幕末改革的连续展开
- 二 幕末改革的广泛影响

第二章 幕府统治的崩溃与明治政权的建立

第一节 美国的东亚政策与日本的开港

- 一 美国的跨洋西进
- 二 日本开港的过程

第二节 开港后国内矛盾的激化与幕府统治的崩溃

- 一 开港后的国内矛盾及其演化
- 二 从尊王攘夷到武力倒幕

三 戊辰战争的进程、意义和特点 轶远

第三节 中央集权体制的建立与近代化基本国策的制定 轶远

一 中央集权体制的建立 轶远

二 近代化基本国策的提出 轶远

第三章 欧化时期的维新变革 轶远

第一节 围绕中心环节展开的各项改革 轶远

一 换个角度观察明治维新的改革举措 轶远

二 武士的改造和转化成为改革中心环节的原因 轶远

第二节 欧风劲吹下的破与立及其矛盾关系 轶远

一 欧风劲吹下的文明开化风潮 轶远

二 文明开化风潮中的各种矛盾 轶远

第三节 自由民权运动的兴起 轶远

一 自由民权运动的导火索 轶远

二 政治斗争与理论斗争的并行 轶远

第四章 民族化时期的维新进程 轶远

第一节 自由民权运动的挫败与近代天皇制的建立 轶远

一 明治十四年政变 轶远

二 后期自由民权运动从高潮走向沉寂 轶远

三 近代天皇制的组建 轶远

第二节 经济政策的调整与产业革命的开始 轶远

一 四项经济政策的调整 轶远

二 政策调整的效果 轶远

第三节 支撑近代天皇制的三大支柱：藩阀、军阀和财阀 轶远

一 藩阀与藩阀政治的特点 轶远

二 军阀及其特点 轶远

三 财阀的分类及其特点 轶远

第四节 明治时期社会思潮和对华观的演化 轶远

一 从热衷欧化转向国粹主义 轶远

二 从鼓吹人权自由转向尊崇皇权至上 轶远

三 对华观由和平友好转变为轻蔑敌视 轶远

第五章	“大日本帝国”的武力崛起	轶闻
第一节	激荡的东亚形势与日本的选择	轶闻
一	面临欧美列强挑战的东亚传统国际体制	轶闻
二	日本颠覆宗藩关系体制的最初行动	轶闻
第二节	“大陆政策”与中日甲午战争	轶闻
一	“大陆政策”的思想源流及其形成过程	轶闻
二	中日甲午战争的进程及其影响	轶闻
第三节	日俄争夺与日本吞并韩国	轶闻
一	日俄争夺朝鲜半岛的主导权	轶闻
二	日俄战争与韩国的保护国化	轶闻
三	日美关系的变化与日本吞并韩国	轶闻
第四节	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与跻身世界五强	轶闻
一	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与侵华新步伐	轶闻
二	跻身世界大国行列	轶闻
第六章	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的社会思潮与方向选择	轶闻
第一节	一战前后的经济发展 新兴工业地带的形成与阶级关系的变化	轶闻
一	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的经济发展	轶闻
二	战时和战后经济的发展与四大工业地带的形成	轶闻
三	近代新兴阶级的成长与阶级关系的变动	轶闻
第二节	战前与战时的主要社会政治思潮及其运动	轶闻
一	形形色色的社会思潮	轶闻
二	第一次护宪运动	轶闻
第三节	一战后的社会思潮的团体结社与运动	轶闻
一	一战后的国内形势与团体结社的特点	轶闻
二	结社团体的竞争与分化	轶闻
第四节	政党政治时期的方向选择与社团活动	轶闻
一	第二次护宪运动与政党政治	轶闻
二	政党政治时期的左右翼政党的活动	轶闻
三	法西斯团体的活跃与工农运动的分裂	轶闻

第七章	法西斯化狂潮与逐步升级的侵华战争	轶恩
第一节	“九·一八”事变与政党内阁的倾覆	轶恩
一	蓄谋已久的“九·一八”事变	轶恩
二	法西斯团体策动的“五·一五”事件	轶恩
第二节	侵华战争的扩大化与加速进行的法西斯化	轶蒙
一	“九·一八”事变的世界反响与日本自绝于国际社会	轶蒙
二	蚕食华北的阴谋行动	轶恩
三	军部法西斯势力的内讧与“二·二六”事件	轶源
四	法西斯政权的登台	轶员
第三节	全面侵华战争与法西斯化的完成	轶远
一	全面侵华战争的爆发	轶远
二	加快法西斯化的步伐	轶员
三	日军的战略进攻与中国军队的顽强抵抗	轶缘
四	法西斯体制的完成	轶苑
第八章	太平洋战争与日本帝国的崩溃	轶蒙
第一节	日美矛盾的尖锐化与日美谈判	轶蒙
一	日美矛盾的不断加剧	轶蒙
二	日美开战前的谈判	轶苑
三	日本军事工业的膨胀和对美战备	轶缘
第二节	太平洋战争的爆发与“大东亚共荣圈”的建立	轶恩
一	太平洋战争的爆发	轶恩
二	“大东亚共荣圈”的建立	轶苑
三	如此“共荣”	轶园
第三节	日本战败与“大东亚共荣圈”的崩溃	轶源
一	日军战场主动权的丧失	轶源
二	中国军队的阻击与盟军的反攻	轶恩
三	日本战败投降与美国对日政策的制定	轶蒙
四	“大东亚共荣圈”的崩溃	轶园

前 言

一部日本近代史,经历了维新变革、扩军备战、对外侵略并最终输掉战争的演进过程。维新自强激发的能量被纳入安内竟外的轨道,侵略战争最终毁坏了变革成果,大起大落,沉浮兴亡。

近年来,日本右翼篡改历史、否认侵略的自由主义史观甚嚣尘上,有必要以史实为据,在研讨近代日本弃旧图新、迅速发展的同时,记述日本军国主义发动血腥侵略战争的罪行,以警喻今世,昭示未来。在这一点上,本书与其他多数的研究著作并无不同。

那么,既曰新编日本近代史,究竟新在哪里?首先,在对日本近代史进程的宏观把握视角方面,力求有所创新,即:

(员)探索日本近代史发展的连续性。与已经出版的日本近代史有所不同的是,本书第一章未将 1853 年美国舰队叩击日本国门或者将天保改革作为日本近代史的开端,而是从近世社会历史环境对近代日本发展的影响入手,在探讨近世与近代的历史联系中,说明日本近代史,尤其是明治维新或日本近代化进程日本特色之所以形成的历史原因。所谓日本特色,包括:①在欧美冲击下,同样面临内忧外患的中日韩三国,只有日本最早组成“官军”旗号下的雄藩联军,推翻了幕府的封建统治,搭上了发展资本主义的末班车。②天皇在近代日本历史进程中发挥了独特作用,参照欧美模式的政治体制改革最终导致近代天皇制的建立。③武士阶级转化为华族,充当了日本近代化的主导力量,在政界、军界、经济界到文化思想界和教育科技界崭露头角。④在近代东北亚率先掀起文明开化浪潮的日本,选择了军国主义道路,对外频繁发动侵略战争,等等。研究这些问题,仅从明治时代寻找原因,显然是不够的。弄得不好,还会因果倒置。但是,如果从日本近世与近代的历史连续性中寻找答案,上述许多问题就不难得到解释。

(圆)关注日本近代史进程中的变异性。历史进程的连续性体现了不同

发展阶段内在的逻辑关系。历史进程的变异性则突出了阶段之间的差别,形成各阶段的发展特点。后一阶段虽是前一阶段的延续,却不可能原封不动地复活已经逝去的一切,通过育新于旧,局部量变逐渐积累着整体质变的能量,最终新旧更替。用历史的变异性来观察日本近代史,不难看出,近代日本发展进程的一个显著特点,在于其充满捉摸不定的大量变数。德川时代(1603—1868)的日本国内长期和平,武士文人化并热衷于学理的研讨。明治时代(1868—1912)的日本,却转而国民皆兵,外战接连不断。大正时代(1912—1926)的民主运动过后,竟然是法西斯的横行。昭和初期(1926—1945)一度推行理性协调外交的日本狂傲地自绝于国际社会,景色优美的日本列岛变成了对外侵略的大兵营。近代日本经过半个多世纪的近代化急行军,在1922年举行的华盛顿会议上,世界级强国的地位进一步得到国际条约的确认。然而,只过了13年,日本帝国兀自陷入侵华战争的泥潭。再过15年,“大日本帝国”崩溃,国际地位一落千丈。有关近代日本历史进程变异性的探讨,为本书的重点。其中,第二至第五章着重研讨日本何以通过维新自强而武力崛起,第六至第八章主要评析国策抉择错误和侵华战争必败的原因。

(猿)全面观察近代日本历史的发展整体过程。将倒幕维新运动兴起至战败投降的近代日本历史全过程,作为一个整体来观察,不仅符合历史的真实,也有利于评论其历史进程中的成败得失与是非功过。如何评价明治维新的成败得失,在学术界存在着各种观点。概括起来看,大体有三种看法,即肯定论、否定论和成败兼而有之论。相形之下,成败兼而有之论更全面一些。从封建主义社会向资本主义社会转换的角度来看,明治维新是成功的。通过维新,日本历史性地走上资本主义道路,明治时代以“与万国对峙”为最高国家目标,以“富国强兵”为主体的基本国策,曾给日本带来武力崛起于东北亚的结果。但同样是这个基本国策,却因昭和初期决策者的判断失误和国际形势的变化,把日本引向战争的深渊并导致战败投降。因此,对明治维新的评价,应当运用辩证的两点论,分清其成败功过。

第二,转换具体内容取舍和记述的角度,力求有些新意。

本书除了第一章与通常的日本近代史陈述有所不同外,其余章节的标题,与已经出版的日本近代史编排大同小异。在这种情况下,只得“旧瓶装新酒”,以求内容上有些新鲜之感。本书第三、第四章主要说明明治维新的进程,但分成欧化和民族化等两个发展阶段,突出不同时期的不同特色。对众所周知的明治维新改革措施,也从武士阶级改造和转化的角度出发,重新

加以审视。第七章记述了日本法西斯化进程,但将其与侵华战争联系起来进行评析,显现两者的互动关系。

近代日本的兴亡,与如何处理与世界大国之间的关系不无关系。尤其是近代日本与中国、美国的关系状况如何,影响了日本国家方向的选择。众所周知,日本自有国家以来,历来重视与世界大国的关系。在古代,从汉代倭奴国到魏晋的邪马台国和南北朝时期的倭五王,缘起余年间,历代日本国王无一例外地主动通交,借助中国帝王的权威,增强在国内的统治地位并威压朝鲜半岛国家。盛唐时代,富强的中国曾经是日本从政治体制、赋税制度到语言文化、节庆习俗全面效仿的榜样。到了近代,落后而贫弱的中国,成为日本民族主义蔑视的对象和军国主义的用武之地。中国的沉沦,成为日本武力崛起的最大国际契机。军国主义的侵略,将古代中日友好交流的主流扭曲为此消彼长、水火不容的敌对关系,东北亚也因此而无宁日可言。被军国主义侵华战争扭曲的中日关系,只能靠抗击侵略的民族解放战争来纠正,以恢复和平友好的应有状态。其前提,是中国的富强与统一和日本军国主义战争机器的废弃。在日本近代史的发展过程中,缺乏对中国因素的分析,许多问题就说不明白。因此,第七、第八章的记述分析了中国因素在日美矛盾激化过程中的作用,以及中国抗战对日本国内政局的影响,并且用一定的篇幅记述中国军民抗击日本法西斯侵略的贡献,并非将太平洋战争仅仅理解为日美之间的战争。

除中国之外,对日本近代发展影响日益增强的国家,当属美国了。日美两国只是到了近代,才建立起恩恩怨怨的复杂关系。美国按照既定的近代远东政策,选定日本为其东亚战略依托,以不战而屈人之兵的武力威吓,敲开了幕末日本的国门,使之在加入近代条约体系的同时,开始了近代化的艰难探索。在日本武力崛起的过程中,美国推行的对日政策至关重要。日俄战争结束后,日本作为帝国主义新的列强成员出现在远东,日美矛盾开始浮现出水面。然而,直到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前,美国对日本的传统政策并未发生根本性的变化。日本联合舰队偷袭珍珠港,以及陆海军侵占菲律宾、关岛战争行动,促使美国在苦涩中大幅度调整传统的东亚政策,转而扶植中国,对抗日本,务求太平洋战争的胜利并重新规划远东的国际秩序。美日之战,加速了日本军国主义总崩溃的进程。在太平洋战场与日军苦斗的同时,美国按照新东亚政策的战略思考,也制定了敦促日本投降的方针和战后对日政策,对战时和战后日本的发展,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基于上述认识,在第二章第一节集中介绍了美国的东亚政策;在第八章也涉及了太平洋战争

期间美国对日政策的制定等问题。

第三,在史料的运用上尽量具体化。一般来说,教材多用相对概括的用语来叙述历史发展进程,直接引用的史料和注释都不太多。在篇幅允许的范围内,本书尽可能详细地引用第一手资料。目的之一,是为对日本史感兴趣的读者提供具体一些的资料,至少能够提供查阅图书资料的线索。

在搜集资料的过程中,得到北京大学图书馆、北京大学历史学系图书资料室、南开大学日本研究院图书馆、早稻田大学图书馆、东京大学图书馆、新潟大学图书馆和人文学部图书资料室、御茶水女子大学图书馆、韩国高丽大学图书馆提供的借阅便利,以及研究生们的协助,教育部和北京大学出版社在立项和出版方面给予有力支持。在此,一并表示衷心感谢。在这里,还要向多年从事日本近代史研究的国内外先学,表示敬意。如果本书能够以先学研究为基础,在研究视角、内容取舍和史料选用等方面取得某些进展,则不胜荣幸之至。当然,开卷是否有益,就有待读者评论了。

宋成有

2009年 8月 25日于北京海淀蓝旗营

第一章

幕府时代的历史遗产

作为一场全面的社会改革,明治维新成败的关键,既取决于维新官僚集团主观能动性的发挥和决策的明智,也取决于前政权为维新官僚有所作为提供了何种环境和条件。就后者而言,维新官僚是幸运的,因为幕府时代的历史遗产出人意料的丰厚。在此基础上,武力倒幕派才有可能用较短的时间完成政权的更替,并迅速转变为维新官僚,因势利导,推行新政,为日本赢得了社会转型的宝贵历史时机。

第一节 权力更替机制的遗产:双重二元 政治结构及其功能

一 幕藩体制的制度构成要素

幕府集权与诸藩分权、将军至强与天皇至尊等双重二元政治结构,是建立在江户时代基本社会制度,即幕藩体制基础之上的。因此,要理解双重二元政治结构,有必要首先弄清幕藩体制的制度构成要素。自元禄元年源赖朝创建镰仓幕府(1199—1333)后,武士阶级在天皇朝廷的律令体制之外,另立军人专政的武家政权。经过室町幕府(1336—1573)统治时期的进一步发展和安土桃山时代(1573—1603)丰臣秀吉的强化,至江户幕府时期(1603—1868),武家政权形成组织严密的幕藩体制。其基本构成要素是:

第一,兵农分离原则。“兵”,即处于统治地位并脱离生产劳动的武士阶级;“农”,是以自耕农(“本百姓”)为主体的生产者阶级。平安时代(794—1185)庄园制兴起,庄园农民平时务农,战时武装起来参加战斗,作为新兴阶级武士登上历史舞台。在元世纪后半期织田信长、丰臣秀吉统一日本的过程中,丰臣氏为巩固统一成果和用兵海外,通过元禄元年率先在山城国实行,

而后推广至全国的“太阁检地”，重新丈量土地并确立耕地领有权，一举废除了庄园制。检地的目的主要有两个：其一，在于彻底切断武士与农业生产劳动的关系，令其离开农村，一律迁居至城市，变成依赖主君赏赐俸禄为生并专供驱使的寄生阶级；其二，将农民世代代束缚于农田，生产封建领主阶级所需要的“年贡米”，维系武士阶级的统治，从而完成了在社会生产和社会分配双重意义上的“兵农分离”。这种统治方针导致了武士和农民的身份制度的固定化和法律化。江户幕府的创立者德川家康继承了丰臣秀吉的兵农分离的方针，并通过颁布一系列法令，加以补充和完善。元和元年（1624）的《武家诸法度》规定“左文右武，古之法也”，“弓马者是武家之要枢也”，必须随时演练。^① 庆安二年（1649）幕府针对农民发布布告《庆安御触书》，规定农民只管“专心耕作，关心庄稼的长势”，必须“朝起薅草，白昼在田地耕作，夜晚搓绳编织草鞋”。^② 武士专门习武，农民一心务农，兵农分离，各司其职其业。

兵农分离，奠定了士农工商社会等级身份制的基础。在德川时代，据享保六年（1691）进行的首次人口统计，日本全国被编入身份制的人口大约为 1000 万，加上身份制之外人口，大约为 1400 万左右。^③ 据幕末人口统计，武士约为总人口的 10%，农民约为总人口的 60%，也就是说，仅士农两个等级，已占据了日本人口总数的 70% 左右；其下依次为：町人为 10%，秽多、非人等贱民为 10%，神官、僧尼为 10%。^④ 兵农分离的结果，使绝大多数的日本人分别被划定在武士与农民等两大身份等级之内。其余的数百万日本人，主要是手工业者“职人”和商人“町人”，从而形成了士农工商顺序排列的身份等级制。

在士农工商等级身份制度的框架内，统治阶级武士作为世袭的职业军人，垄断军事、警察部门，拥有佩刀、称姓，即通称“苗字带刀”和“杀人而官不问其罪”，即“切舍御免”等特权，^⑤ 凌驾于农工商等其他社会等级之上。在武士内部，又分成从执掌幕藩各级政权的家臣幕僚到冲锋陷阵的步兵“足

① 《德川禁令考》第 1 卷，林屋辰三郎等编：《日本历史史料大系》第 1 卷，《近世》员大阪书籍股份公司，1982 年，第 1 页。

② 同上书，第 1 页。

③ 关山直太郎：《日本的人口》，至文堂，1982 年，第 1 页。

④ 同上书，第 1 页。

⑤ 聂长振、马斌译，周一良校：《明治维新基本文献史料选译》，《明治维新的再探讨》（《世界历史》增刊），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 年，第 1 页。

轻”等几十个等级。武士内部的上下级之间层层隶属,个人不得“退仕”自行改变武士身份或“脱藩”擅离职守,以效忠主君为第一要务,形成相对稳固的统治序列。作为体现武士阶级的人生价值观念、道德准绳和社会优越意识的精神信条,武士道在德川时期非常盛行。

农民在德川时代被称为“百姓”,是农业社会的主要生产劳动者。封建领主认为“百姓乃天下之根本”^①,推行重农抑商政策。因此,农民的社会地位仅次于武士,而居工匠、商人之上。在农民等级内部,也按照各自在村中的地位、财产的多寡、担负封建地税的能力和数量,划分成不同层次。地位最高者,是在当地素有影响和实力的“草分百姓”、“持高百姓”,有权出任村吏,管理和代表本村,完成赋役、治安、禁教等各项差遣。位居其下者,是农民中人数最多的自耕农“本百姓”,他们的名字被写进土地户口账簿“检地账”,拥有家屋和耕地使用权,他们也被记入村内收租账本“名寄账”,承担缴纳年贡、杂税等义务。作为交换,他们拥有领主承认其在村社地位的“百姓株”,享有田渠用水权和山林用益权。地位又等而次之的,是相当于佃农的“名子”、“被官”,他们是隶属于“本百姓”的依附农民,不具有相应的权利。处于农民等级最下层的赤贫农民,称为“水吞百姓”,他们未被记入检地账,也无任何权力,经常流离失所。

居住在城市街区下町的手工业者和商人,也各按行业分工分别居住在职人町或商人町,各由职人头或商人司负责管理,内部实行自治。职人分成效劳于领主的“御职人”或从事一般手工业生产的“平职人”,彼此地位高低不同。商人则分成地产和店铺的规模很大、独立经营并拥有专卖权的御用商人“本町人”,其中少数御用大豪商为“扶持町人”,可以称姓、佩刀、骑马,分享准武士的特权待遇;“家持”、“大屋”等上层本町人把持了町街事务。无地产、房产的商人地位低下,其中借地租房者“借家人”无权参与町政,也不受任何保护,处于被支配的地位;“驻马”、“连雀”,是摆地摊的小商贩或走街串巷的流动商贩,地位最低,无任何权利保障。

在士农工商等级序列之外,还存在一种特殊的贱民。他们居住在町街特别划定的区域内,与外界隔绝,备受屈辱和蔑视。贱民分成从事屠宰、制革等被佛教视为不洁行业的“秽多”,由“秽多头”管理;此外,行乞者“非人”主要从事行刑时的服务性工作,他们被禁止束发,以示区别。

皇室、公卿、神官、僧侣等游离于士农工商等级身份制度之外,其重要性

^① 《本佐录》林屋辰三郎等编:《日本历史史料大系》第 源卷,《近世》员第 四〇〇页。

与幕藩领主实力的强弱成反比。其中,天皇朝廷是建构双重二元政治结构不可缺少的重要环节。

第二,石高制。“石高”,即体积称量单位“石”的数量。一石约为 60 升,相当于 60 公升,重约 60 公斤。由石高表明领主领地多寡、家格高低和承担军役轻重以及农民承担年贡、杂役数量的制度,即石高制。这种发轫于丰臣秀吉,完备于德川家康祖孙三代。在石高制的框架下,领主和武士的俸禄“知行”数量和提供军役的多寡,以单位面积稻谷年产量石的数量来计算。这种牵涉社会各阶层切实利益的石高制首先具有经济意义,同时也具有政治意义和社会意义。

德川时代日本全国的耕地总量,按稻米产量计算,在庆长五年(1600)为 1000 万石,庆应三年(1627)为 1000 万石;取中间数,则为元禄年间(1688—1703)的 1000 万石。^①其中,幕府占有约 300 万石,将军家族直接占有约 100 万石,称“天领”或“御料所”;其余的约 600 万石分封给将军的直属家臣“旗本”和“御家人”。除去将军家拥有的土地外,其余耕地分别由号称“三百诸侯”的 300 余家大名等级所有。大名对其领有的耕地一般自留 1/3 至 1/2,其余部分多以禄米分授给家臣。这样,就形成了从将军到大名,再到家臣武士等递次排列的金字塔式的土地占有关系。土地归整个武士阶级所有,但所有权并非平均分配。其中,幕府将军拥有对大名土地领有的绝对支配,表现为:大名的领有权必须经过将军的认可,并以加盖“领知朱印状”印章为凭据;每逢将军或大名发生变更,大名必须重新向幕府将军宣誓臣服,呈交其领地清册,再由将军发给承认其领有权的“领知安堵状”,方能正式取得统治地位。将军和大名还对各自的家臣武士授予俸禄,承认其领有权。在德川时代,耕地是基本生产资料,农民缴纳的年贡米是最重要的财富。对于寄生的武士阶级来说,来自石高制的封建地租年贡米的收取权,是其赖以生存的基础。其经济意义,无可取代。

与此同时,石高制还具有强烈的政治意义。一方面,经济利益决定了统治阶级的主从关系。家臣武士对主君、诸藩大名对幕府将军的政治主从关系,上尊下卑的效忠理念,稳定的统治秩序等,无不与年贡米的获得和分配密切相关。诸藩大名对幕府将军的臣服的经济基础,是幕府将军给予的领地以及对其领有的承认。家臣武士对主君效忠“奉公”的物质前提,是主君

^① 安藤良雄:《近代日本经济史要览》,东京大学出版社,1982年,第 100页;林屋辰三郎等编:《日本历史史料大系》第 10卷,《近世》第 100页。

分授给家臣武士的“御恩”即俸禄。换言之,只有幕府将军“安堵”了诸藩大名,大名才能“安堵”家臣武士,统治集团的秩序的稳定和有序化才有牢靠的保障。另一方面,经济利益规定了各地大名服从最高当局应尽的义务。1609年丰臣氏按照每百石提供缘名士兵的比例,命令大名按照石高提供军役。据此,丹后国(今京都府境内)细川氏石高愿万石,军役量为源四名,因幡国(今鸟取县境内)宫部氏石高源万石,军役量为源四名等,供中央权力驱使。^①德川家族沿用了丰臣氏遗制,使源出石高制的经济利益继续制约武士阶级内部的主从关系和军事关系。

石高制的社会意义主要表现为:社会各环节能否正常运转,均同年贡率高低和大米市场价格的波动直接相连。德川时代初期,年贡米的上缴率一般为农民收获量的源左右,即所谓“四公六民”。除了缴纳村费、杂税之外,农民手中尚有结余,生产积极性得到保护,自发的稻米增产热情奠定了江户开府后百余年间经济繁荣的基础,繁华的元禄文化应运而生。此后,武士阶级文恬武嬉,领主们奢靡无度,提高年贡率以加紧盘剥农民,成了幕藩领主填补财政亏空的基本手段。“四公六民”的年贡率,被不断上调为“五公五民”、“六公四民”,到后来甚至调高到“七公三民”,乃至更高。农民的生活和生产陷入难以为继的困境,社会再生产的良性循环遭到破坏。在商品经济的冲击下,农民的贫富分化在加剧。特别是在本百姓阶层中,少数上层本百姓亦农亦商,兼收破产农民的土地,出租获利,上升为富夸一方的豪农豪商;多数本百姓沦为领主、豪农豪商多重盘剥的对象,逐渐贫困化、佃农化。

不断调高年贡率不啻杀鸡取卵,从源头上损坏了向武士阶级稳定提供年贡米的运营。结果,势必造成武士,特别是中下级武士因“御恩”的减少或断档而心怀不满,“奉公”意识消极化,统治阶级内部摩擦增大,主从关系、效忠序列发生着系统性的裂变。社会阶级对立与矛盾随之加剧,农民的反抗斗争的方式和力度日趋激烈,和平请愿式的“强诉”往往被武装暴动“一揆”所取代。整个日本社会不可避免地进入动荡时期。

第三,正统官学朱子学。朱子学即宋儒理学,因其集大成者朱熹(1130—1200)而得名。朱子学在镰仓时代由入宋学问僧传入日本,主要由寺僧或朝廷公卿们研修阐释。经室町时代后期,即战国时代(1467—1568)的儒佛一体化,加快世俗化。至江户时代,进一步普及化,并被选定为正宗

^① 山口启二等:《织丰政权论》,《讲座日本史》源《幕藩社会》,东京大学出版会,1982年,第170页。

官学,成为幕藩领主进行思想统治的得力工具。

在朱子学官学化的过程中,发挥了关键性作用的两个人物是藤原惺窝(1561—1619)和林罗山(1583—1658)。藤原好儒学,1592年在被俘来日的朝鲜鸿儒、刑部员外郎姜沆的指点下,倭训“四书”、“五经”,为朱子学的普及创造了必要条件。藤原对“天理”和“心性”的阐释,以及从格物致知、意诚心正、修身齐家到治国平天下的治学入仕的路数,悉遵朱子学的规范。同时,又在著述的《寸铁录》、《大学要略》、《假名性理》等著作中,将宋儒的学说用于对幕藩体制原理的阐述。例如,在解释大学之要在“明明德”时,藤原认为“五常者常德也,常德也者明德也”,“达古今不可得而变”,“自其天述、天秩不可得而紊”;对五伦,则定性为“天有”的“显道”,也是“明德”的真谛之一。藤原认为“民,士农工商四民,四业也”,强调武士有贤能,自然应被举用;农提供衣食,工各司其职,商通有无,农工商身份有序,应有上下尊卑之心。^①其弟子林罗山悉得师教,1618岁开塾授徒,讲解《论语》和《四书集注》,“来闻者满席”。^②朝廷明经家清原秀贤忌其才,诬告罗山欲治其罪,反使罗山得以拜见德川家康。问答之间,喜读《论语》、《中庸》和《史记》、《贞观政要》等典籍的德川家康对罗山的学识十分赏识,委以重任。林罗山遂参与幕政,起草法令文书,并先后出任家康以来前四代将军的儒学师傅“侍讲”,成为林家世代垄断朱子学研究和解释权的开山鼻祖。在朱子学兴盛的风气之下,第五代将军德川纲吉把林家修建在上野忍冈的孔庙迁至神田的汤岛,并于1685年建成了规模宏大的孔庙汤岛圣堂,也称昌平坂学问所,昌平夤成了当时官学的最高学府。诸藩大名也竞相在各自的藩校中研修朱子学。在元和酈武即日本实现国内和平之后,武士群中一片尊孔诵经声,并对町人、百姓不无影响。元禄一享保年间(1690—1700),朱子学在日本进入全盛时期。

幕府领主之所以选定朱子学作为思想统治的正宗官学,是由于它的思辨性、系统性和御用性。朱子学既有令人揣摩回味的思考空间,更具有钳制思想、强化君臣关系和身份秩序的现实功能。作为后期儒学的集大成者,朱熹将佛学的思辨性、道教的天人合一观乃至玄学的穷究玄机思维方式引入先秦儒学,形成了系统的太极衍生论。朱熹以理气二元论来阐释宇宙太极的演化,从而把儒学推向宋儒理学的新阶段。朱熹提出太极贯通天理与人

^① 《大学要略》,《日本思想大系》第1卷,藤原星窝、林罗山,岩波书店,1958年,第136—137页。

^② 《林罗山年谱》,林屋辰三郎等编:《日本历史史料大系》第13卷,《近世》第1卷,第136—137页。

伦的论说,主张“存天理”、“灭人欲”,以正君臣、父子名分伦理,并把“持敬穷理”、“格物致知”作为“修身”、“养性”、“齐家”,即个人内悟修养的根基,最终实现“治国”、“平天下”的政治抱负。上述论说,虽不出“学而优则仕”的老路数,但孔孟的纲常伦理被朱熹笼罩上永恒太极的神秘光环,君臣名分、人伦道德也随之成为万古不易、至高无上的行为终极价值取向。这种强调个人修养、安分守己、报效君父等主张,对维护幕府统治和封建秩序十分有利。因此,朱子学在德川时代被选定为正宗官学,成为支撑幕藩体制的精神支柱、道德规范和价值准则。值得注意的是,在明清时代的中国和朝鲜时代的韩国,最高统治者也同德川时代的幕府将军一样,奉朱子学为正统官学。这种政治文化现象的背后,隐藏着三国统治者共同的政治需求,颇有研究价值。

在整个德川时代,朱子学拥有无可取代的主流地位。其主要表现是:

其一,始终享有独尊的殊荣。在德川时代,除朱子学之外,同属儒学范畴的还有阳明学、圣学、古义学、古文辞学、折中学、水户学等诸多学说。但是,幕府最高当局所极力推崇和倚重的,唯有官学朱子学。在幕府强盛时代是如此,在幕府统治走向衰落以后乃至危机时期就更是如此。例如,在填补府库亏空、重振幕府权威的享保、宽政、天保等三次改革中,朱子学成为推行改革的重要工具。主持享保改革(1796—1806)的第八代将军德川吉宗,为整肃纲纪、振奋士气以减缓财政危机的压力,带头远离奢华,倡导节约简朴。作为灭人欲、正民心的重要举措,吉宗下令再兴圣堂,并招集幕臣、大名于此,亲自讲授朱子学。他还下令出版《六谕衍义》等通俗读物,在民间宣扬朱子学的伦理道德。主持宽政改革(1806—1818)的松平定信,下令查禁“异学”,即查禁除朱子学以外的其他儒学学派,重申在昌平黉学问所只允许讲授朱子学。同时,他还编辑、出版和发行《孝义录》之类的通俗读物,通过书中的忠臣、孝子、节妇的生动故事,把朱子学的说教形象化地推向社会下层,以取收拢人心之效。天保改革(1830—1836)的主持人水野忠邦亦步亦趋,率先参拜圣堂,出版发行《修身孝义鉴》、《蒙童教训》等社会教化读物,试图借助朱子学的说教,补救千疮百孔的幕府统治。相形之下,其他儒学分派往往境遇不佳。阳明学的倡导者熊泽蕃山被监禁,其学派中断多年。直到幕府后期,阳明学才恢复生机,涌现出诸如大盐平八郎、吉田松阴、西乡隆盛、高杉晋作等一大批信奉阳明学的倒幕风云人物。

其二,朱子学是统治阶级的统治思想。在德川时代,武士阶级是统治阶级。借助儒学的理论升华,原本在平安时代即已存在于武士阶级中的御恩